

序

陈秉刚同志自大学毕业后长时间在嘉峪关市酒钢工作，没有离开文教系统。由于他日常工作中的留心察访，及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研究，对嘉峪关这座历史名城有关的山川地理、文物古迹，无不了然于胸。到花甲之年，著《嘉峪关探幽录》，书成，以打印稿相寄。予为之校读一过，觉文笔精悍，内容充实，字里行间，时有新发现、新考证，纠正了不少前人和今人说法上的谬误，是一部有质量的好书。而我，作为他多年的老相识、忘年交，写几句弁言，实有不能已者。

作者在其书的开头，为嘉峪关、嘉峪关正名，以纠正一些人在地理概念上的错误。

嘉峪关，本是建在嘉峪山西麓的一座关城，而嘉峪关则是“突起于祁连山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由东南向西北逶迤蜿蜒，全长 60 华里（引作者语）”，不同的段落，当地民众有不同的称谓，如西南段的文殊山便是。文殊山，可能因五凉时期所建佛教石窟寺而得名，其名远不显。但自元代喃啞失太子重修文殊寺，降及明代，佛、道两教寺庙林立，香火旺盛，远近闻名，于是嘉峪关本名反为文殊山所掩盖。作者引用少为人知的《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考证以明之。随即严肃地指出：1990 年版的《嘉峪关市文物志·概述》中误把讨赖河截断的西北岩岗和山峦当成整个嘉峪关，于是就把本来建在嘉峪山西麓的关城给搬到“东南麓”去了；还有，国内一家报纸的《百科知识》更把与嘉峪关毫

不相干的北边的马鬃山也扯到一起。地理概念不清，想当然地写《百科知识》，违反科学态度，应深以为戒！

作者为嘉峪关正名以纠正一些人在地理概念上的错误之后，即以这座历史名城为据点，突破一点，带动全面。在时间上，上推夏商，下及清末；横贯河西走廊，远及西域，纵横驰骋，贯通古今，展开了全方位、深层次的论述。

作者引用古辑本《竹书纪年》以考定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在酒泉郡西石峪口所建玉石障，即《竹书纪年·夏纪》所载“宾于玉门”之古玉门关（在嘉峪关以西小方盘城附近的玉门关遗址，是汉析置敦煌郡后所筑，是将古地名西移而已）。又联系到五代后晋天福年间高居诲使于阗时，在其《行纪》中所记“至肃州（酒泉），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之“天门关”，按方位、里程正好是西汉所筑玉石障，亦即《竹书纪年》所载之古玉门关，而“天”字则是“玉”字在传写中出现的笔误，极是！作者将前后的历史记载联系起来加以考证，解开了古玉门关地理位置的一大难题。

在《呼蚕水·讨赖河》一章中，作者详细考述了这条流经嘉峪关之南而灌溉嘉峪、酒泉两市及金塔一县三个绿洲的重要河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称的历史沿革。汉代谓之呼蚕水，清代叫做讨赖河。前面已提到的后晋《高居诲使于阗记》所记“至肃州，渡金河”的“金河”又是这同一条水的别名。作者从敦煌遗书中找到了根据，P2672号写卷明白记载“金河，亦名呼蚕水也”。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清乾隆年间肃州道黄文炜主编的《重修肃州新志》把金河、呼蚕水当成两条河的错误，对修编地方志做出了贡献。

在《黑山岩画》中，经作者实地调查，并利用玉门市火烧沟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断定最早的岩画，当是夏、商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古代羌族人的作品，最晚者则到了元明时期。因为其中的

一组画，绘“有4幅喇嘛庙图，并有古藏文遗迹”。而喇嘛教兴起于13世纪的藏传佛教，传入元朝而为蒙古人所信奉。故作者认定最晚的岩画，当出自元、明时期聚居在嘉峪关外的蒙古族喇嘛教僧侣之手。从而纠正了把黑山岩画笼统地归之于战国时期的不正确说法。

在《新城魏晋墓壁画》章节中，作者考述了距嘉峪关市东南25公里、占地13平方公里的魏晋古墓群出土的文物。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清理，这些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壁画和砖画，是出自没有留下姓名的当时、当地民间画工之手的杰作；这些画，不仅描绘了墓主人家居生活的细节，而且有劳动人民耕种、收获、放牧、植桑、养蚕、纺织等多方面的生活场景，不仅提供了魏晋时期河西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还弥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生动地记述了2002年9月，经考古工作者抢救、发掘的一座东晋二室砖结构墓出土的极为珍贵的文物；其中有3件有丝绸制作的花束，6件丝线板，花束用质地精美、色彩鲜艳的丝绸做成，既有含苞待放的花蕾，又有灼灼盛开的花朵，几近乎乱真；6件丝线板缠绕其上的是金、绿、黑三种颜色的丝线，保存完好。这些均为罕见的文物珍品，经作者介绍，使我这个孤陋寡闻者首次读到这批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读后为之惊喜！这批文物不仅目前国家所仅有，而且出自偏远的甘肃河西，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有的学者认为“汉、唐时期河西、陇右只种麻织布，不产蚕桑”的固执偏见。因为没有充裕的丝绸产品，是不会拿它来做观赏的花朵的。

作者对河西屯田写了专篇。总结了历史经验，揭示了上游控水，滥施开发；下游断水，造成荒漠化的严酷史实，为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作者还为12位有关的历史人物写了新传，其中不仅有大名鼎鼎、明初创建嘉峪关的将军冯胜；晚清出关收复新疆，保我西

腫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还有鲜为人知的明代中期筑“北长城”的彭清；修“明墙”、“暗壁”以固雄关的李涵等，对他们钩沉辑遗，加以表彰，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些曾经捍卫祖国边疆，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们，其用心可谓良苦！以上所言，只是笔者读后星星点点的感受，挂一漏万。细心的读者读了本书，自会有全面的了解。

秉刚同志为人正直，无愧于他那个“刚”字，文亦如其人，有刚劲之风。是为序。

陈守忠

于西北师大退思室

2005年3月春分日

目 录

序 ()

第一编 讨源显幽篇

一、嘉峪山·文殊山 ()

二、呼蚕水·讨赖河 ()

三、塞·遮虏障·边墙 ()

四、屯田·军屯·民屯 ()

五、开关"通贡"·闭关"绝贡" ()

六、关城·商埠 ()

七、关西七卫 ()

八、西王母·王母祠 ()

九、文昌阁·关帝庙 ()

十、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 ()

十一、新城魏晋墓壁画 ()

十二、《冯胜传》勘误·"极边"考辨 ()

十三、立此存照 ()

第二编 人物春秋篇

一、隐居嘉峪山的教育家宋纤 ()

- 二、嘉峪关城创建人——冯胜 ()
- 三、李端澄"五彩装成碧玉楼" ()
- 四、"北长城"的修筑者彭清..... ()
- 五、以身殉职的游击将军芮宁 ()
- 六、运筹嘉峪保卫甘肃的陈九畴 ()
- 七、翟奎巡边至嘉峪 ()
- 八、李涵监筑"明墙"、"暗壁"固雄关 ()
- 九、政绩卓著的甘肃巡抚杨博 ()
- 十、振兴屯政的庞尚鹏 ()
- 十一、林则徐出嘉峪关 ()
- 十二、左宗棠与嘉峪关 ()

第三编 千年沧桑篇

- 嘉峪内外大事记 ()
- 跋 ()



第一编 讨源显幽篇





一、嘉峪山·文殊山

(一)

嘉峪关因嘉峪山而得名。嘉峪山，是突起于祁连山主峰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由东南向西北逶迤蜿蜒，全长 60 华里。在嘉峪山的中段，有东西二峰：东峰是山的主峰，位于西二分沟正南，海拔 2227 米；西峰仅次于东峰，与嘉峪关城南北相望，摩肩并立。

——元喃哒失太子立《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中说：“肃州西南三十里嘉峪山者，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归心，林泉秀美，涧壑寂寥，神光现于长空，石室藏于畔侧。”

——《明史》卷 43《地理志三·肃州卫》中说：“（肃州）西有嘉峪山，其西麓即嘉峪关也。”

——《清史稿》卷 64《地理志十一·甘肃》中说：“（肃州）西嘉峪山，其西麓设关，俄罗斯通商孔道，税务司驻焉。”

——乾隆年间《重修肃州新志》卷 2《山川·景致》中说：“嘉峪关，在（肃州）城西七十里，嘉峪山西麓，明初置。”“文殊山，（肃州）城西南三十里。山峡之内，凿山为洞，盖房为寺……旧称有三百禅室，号曰‘小西天’。”“其山口透卯来泉路，口内有唐贞观所遗佛像，又有元太子喃哒失《重修碑记》……山



祁连山·嘉峪关（关城南远处为祁连山，近为嘉峪山）

上獐鹿攸伏，树头鸟雀喧呼，幽林雅趣，是佳景。”

以上是历史碑铭、文献要籍的摘录（其中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从这些史料中，我们了解到：明代以前，现在的文殊山本名嘉峪山；明代以后，嘉峪山才有了文殊山这个别名。“西山古刹”也成了肃州八景之一。

文殊山因文殊寺而得名。文殊山石窟寺是河西九大石窟寺之一。早年在文殊山的前山、后山有寺庙 300 多座，石窟 100 多个。山上山下，楼台殿阁举目皆是；前山后山，石窟佛龕星罗棋布；宫、观、庵多为道教所建立；寺与庙多为佛教所奉祀。宋代以来，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因此，信奉者不论道教的神仙、天尊，还是佛教的佛祖、菩萨，都视为神灵，一概敬奉。文殊山成了佛、道文化艺术的胜境。其中以文殊寺最负盛名。



文殊寺的开凿和创建年代，史书甚少记载。《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中，给我们提供了创建年代的线索：“今遇喃哒失太子……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据此上溯，正值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即公元526年（孝昌二年）前后，距今约有1474年。

笔者从嘉峪关市文殊镇驱车东南行5公里，即到文殊山口（古称嘉峪山口）。山峡两侧，断崖壁立，南北两山，层峦叠嶂，沟壑深幽，林木葱郁，流水潺潺，构成一条天然美丽的峡谷。车进山口西南行，约一里许，路北侧的山麓，又分为东西二沟。在东侧叫红庙沟，俗称前山；在西者为后山沟。前山文殊寺即在红庙沟口旁。这是文殊山惟一的一座藏传佛教寺庙。进入寺内，受到一位身穿通肩式袈裟僧人的热情接待。他告诉笔者：“这里的‘护法堂’等建筑，都是近年化缘新建的。1958年破除迷信时，旧寺被拆除了，惟有后面的‘文殊菩萨殿’佛窟得以幸存下来。这里正是元太子一行人来寺进香，见到菩萨显灵，‘天面两分，现五色瑞光’的地方。”在寺僧的引导下，我参观了菩萨殿。殿内坛基前有长明灯，除供奉着金光灿灿的菩萨塑像外，还供奉着十世班禅大师和嘉木样活佛的大幅照片。寺僧拿来手电筒，借助手电的亮光，让我观赏东西二壁及窟顶的壁画。多年的烟熏火燎，已无法看清壁画的内容，但从隐约显现的粗犷古朴的祥云线条看，应是洞窟开凿时所作。

《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中有两处具体的时间记述：“喃哒失太子常闻胜境之地，每慕钦仰之心，同众兄弟等于六月三十日，特进焚香。”落款是：“大元泰定三年岁次丙寅八月丁酉朔，十五日丙戌喃哒失太子立石、弘法僧速那令真撰、秦亭辩吉（刻）。”其中6月30日应是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6月30日进香，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8月1日撰文、镌刻，8月15日立碑。前后相差一年多。为什么？这是由“翻盖重修”文殊寺工程进度



决定的。《碑铭》详细记述了竣工后的景况：“……寺宇周成，材梁整台。殿方高墙，壁乃彩绘。圣容开金面，五色妆就。宝瓶琉璃，结砌周全。钟楼碑楼，工成成就。周围垣墙，悉成已毕。”如此精细、繁杂、宏大的维修工程，只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一年的时间，才能顺利完成。

据传说，喃哒失太子重修文殊寺之后，影响极大，各方善男信女，莫不前来景仰奉祀。尤其文殊菩萨殿，金碧辉煌，“最有灵验”，最获群众信仰。290多年后，约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前后，二世顾家堪布（格尔杰哲华木措）再次对文殊寺进行了大规模维修。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五世顾家堪布（罗桑必嘉木措）在文殊寺坐床。清德宗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六世顾家堪布（嘉祥丹珍尼玛）从拉卜楞寺拜嘉木样大活佛为师，学习经文后，回文殊寺坐床，并主持所属寺庙的佛事活动。“堪布”是藏语音译，意为“师傅”。原系喇嘛教中主持授戒者的职称，后成为寺院住持、方丈及当权僧侣的专称。坐床的堪布本身也是活佛。由此可见，文殊寺也是河西走廊佛教圣地之一。有元延至明、清，民国相继，每逢朔望，特别是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日，连续八天，文殊山有佛道盛会。四乡八堡、山泽草原、宗教会堂、工农商学，皆来朝山拜斗。整个山寺，人山人海，香烟缭绕，鼓乐齐鸣。人们各有所施，各有所求。或了愿算命，或乞求儿女，或企盼婚姻如愿；或献匾献戏，以示虔诚，惟求官运、财运亨通；个个都沉浸在对明天的希冀的其乐融融之中。

清代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出任整饬肃州分巡道的程世绥，写有长诗《观文殊口道场歌》，诗中虽然抒发了自己对佛事道场与众不同的观感，但也记叙了牛鬼蛇神，粉墨登场，观者云集，人畜塞路的盛况。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诗中看到260多年前文殊山佛道盛会的真实景象，现将该诗摘录如下：



欣闻雪岭有珠宫，文殊涅槃栖此中。
观者云集施金钱，老少牛驴塞行路。
是日恶伎进西凉，牛鬼蛇神闹佛场。
夜叉双鬘浑弥戾，修罗两掌尤披猖。
刹犀倒竖久凌夷，掠影希光纷狼籍。
归途瞪目再寻山，山笑人忙我自闲。
静中省识西来意，灵鹫端的满人间。

(二)

地名，在很多情况下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区域范围实体的长期使用、约定俗成并通过某种形式确定下来，用以规范使用、方便交往的一种语言文字代号。地名称谓，各有缘起。或村以所居大姓为名，如杨家庄；或于史有征、岛以名人为名，如秦皇岛；或镇以水名，如临水镇；或山以地貌颜色为名，如黑山；关因山名，山因寺名，屡见不鲜。或俗或雅，仁智自见。秦汉以来，史籍中以地理方位定名的俯拾即是，如“南山”为祁连山的通称。河西地方志中，各地也把祁连山的支脉随之称为“南山”。然而总体称谓较规范，局部称谓却因地而异，即如同为祁连山的一条长60华里的支脉——嘉峪山，其中段，当地人却因山势形状，称之为“鳖盖山”；嘉峪关附近的一段，人们则以地貌颜色，称之为“红山（红土山）”。

上述地名，名皆有因。惟独“嘉峪山”，令人深思。嘉者，善也，美也。峪者，山谷也。西晋文学家陆机《吴趋行》中云：“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嘉峪山因有“嘉峪”（美丽的山谷）而得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个地名，决不是老百姓约定俗



成的称谓，而是带有文人学者为之起名的浓厚色彩。

嘉峪山，起名于何时？是谁起的名？史无记载。笔者不揣浅陋，冒昧推测，以求正于方家。笔者认为：嘉峪山起名于东晋明帝太宁、成帝咸和年间，即公元323年至334年之间，亦即前凉张骏当政时期。著名学者、教育家宋纤是最有可能、最有资格为嘉峪山起名者。理由如下：

第一，《晋书·宋纤传》说，东晋明帝太宁年间，敦煌学者宋纤游学酒泉，因南山（即后来的嘉峪山）有山川林木之胜，峡谷流泉之美，决意“隐居于酒泉南山”。可见，这个时候，仍然只有“南山”而无“嘉峪”之名。

第二，宋纤的才学、品德、名望，使他最有可能、最有资格为所居之地命名。隐居于南山的宋纤，一方面刻苦治学，明究经纬，从事著述，注释《论语》及《诗》、《颂》数万言；一方面聚徒讲学，授业解惑。莘莘学子，趋之若鹜，十数年间，培育出弟子3000多人！但他“沉靖不与世交”，“不应州郡辟命”。前凉酒泉太守马岌闻宋纤大贤，亲备礼仪，慕名前往拜访。宋纤避于“高楼重阁，拒而不见”。马岌十分感慨地说：“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并在石壁之上刻诗而返。诗曰：

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

其人如玉，维国其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

前四句概括描绘了宋纤隐居处的佳域美景，后四句写自己对宋纤的敬仰，尊之为国宝及专门造访，室近人远，不得相见，只有藏之心中，永远怀念。表达了马岌尊师重道、求贤爱土的无比虔诚。

宋纤逝世后，前凉张祚执政时的酒泉太守杨宣，还画了宋纤遗像，供奉于楼阁上，出入观看，尊他为师。并作了一篇《颂》，说：“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宋纤卓尔不



群、出类拔萃的才学、品德、名望，使他受到如此礼遇，也使他最有可能、最有资格为自己隐居之地命名。

第三，虽然，隋、唐、宋、元官方所修史书《地理志》，“肃州”条过于简略，都未提及嘉峪山，但元朝喃哒失太子《重修文殊寺碑铭》，是由名叫速那令真的一位弘法僧人撰写的，其中将蒙古君主“成吉思汗”写作“真吉思皇帝”，将“察合台汗”写成“叉合歹”，惟独准确无误地写明“嘉峪山”，说明此山名很早以前就为人们所熟悉了。很可能是宋纡起名后，经他的 3000 弟子口头广为流传，经久不息，遂成定名。

以上所言，纯系推测。如果将来能在新发现的史料和新出土的文物中得到验证，那将成为笔者聊以自慰的一大幸事！

时至 21 世纪的今天，笔者要大声呼吁：为方便国际国内交往，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抱着为国家、为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使用规范的地名，不能无视史实，妄下断语。如 1990 年 12 月版《嘉峪关市文物志·概述》中说：“嘉峪关南枕祁连山、红山，北倚嘉峪山、黑山，以建在嘉峪山西麓一个地势险要的岩岗而得名。”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知道嘉峪山即是祁连山的支脉，红山是嘉峪山局部一段的别称，误把因讨赖河斩断的西北岩岗和山峦当成整个嘉峪山。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嘉峪关永远不能建在嘉峪山西麓，只能蹲在“东南麓”，待有心人“拉兄弟一把”了。

不久前，国内一家报纸的《百科知识》：“中国古关知多少？”在介绍“嘉峪关”时这样写道：“嘉峪山南屏祁连山脉的文殊山，西北依马鬃山的嘉峪山。两山夹峙，形成谷地。北大河（又称讨赖河）横贯其间，关城踞河北岸的嘉峪塬上。”这段文字，错误有三：1. 把同一座山当成两座山，不知文殊山本名嘉峪山。2. 地理方位严重错位。误把河西走廊南山——祁连山的支脉嘉峪山，说成是北山——马鬃山系的支脉。3、“关城踞河北岸的嘉峪



塬上”，用貌似有理的说法，彻底否定了“关城建在嘉峪山西麓”的历史的正确论断。作者史地概念不清，凭想当然写《百科知识》，缺乏的正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一定要记住：治学者首先必须准确地学习和掌握知识。没有知识的准确性，就根本不会有科学性。这个教训，愿与大家共勉。

(三)

文殊山石窟寺群，与嘉峪关市文殊镇近在咫尺，距酒泉市也只有 30 华里。这里本来是一片古建筑群与石窟艺术宝库。它创凿始建于北朝，盛于隋、唐、五代，元、明、清各代均有增续和发展，是我们的祖先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大胆接受外来佛教艺术而加以消化扬弃之后的结晶。

1951 年，为铲除封建迷信职业者，酒泉县政府曾动员僧人、尼姑、道士，各回各乡，成家结婚，分给土地，参加劳动。致使山寺空虚，无人管理。尽管县文化主管单位制作了文物标志牌，挂置于明显处，实行不定期的巡视管理，但未派专人进驻看管。1954 年成立肃南县时，少数民族代表争要文殊山，当时的酒泉县领导人单纯认为这里是封建迷信活动的场所，就像甩包袱一样十分痛快地把文殊山划给肃南县。石窟寺群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也很快移交给肃南县祁丰区。

或许是受“左”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或许是主事者根本认识不到这些文物古迹的艺术价值，或许二者兼而有之，致使无价之宝的艺术宝库，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管理和保护，反而面临毁灭的危险。有的寺庙成了民居，解决了无房户的困难；有的寺庙当做羊圈，为羊群遮风挡雨，保暖御寒；有的寺庙被拆除，



成了修盖公房和私房的材料。前山百子楼的“住持”告诉笔者：“文殊山前山后山各有一座‘百子楼’。后山‘百子楼’曾被一对青年男女占作结婚新房，因用火不慎，引起火灾，好端端的一院楼被烧掉了！我们前山‘百子楼’是乡政府和工商税务所办公及家属居住的地方，所以没有被拆掉。1993年，因恢复千年民俗庙会，他们才搬出去了！”

笔者认真参观了幸存的“百子楼”。这是座重檐歇山顶式的二层木结构方形建筑，坐北向南，一层为“百子楼”，二层为“三圣殿”，殿四周有廊坊。楼东北及西面有厢房。楼内三壁均有壁画。这里曾经是善男信女们祈祷多子多福、婚姻如愿、家事顺遂、消灾祛难的场所。据“住持”说，“百子楼”是民国时建成的。如此说来，它还不能算作古建筑，只能说是座仿古建筑。在院内正前方阶前右侧，立有一块前些年用水泥制作的“告示碑”，提醒游人元朝喃哒失太子因重修文殊寺而立有“太子碑”。文殊寺被拆毁了，把本该立于“文殊寺”内的“告示碑”转而立在了“百子楼”院内，既与环境不协调，又使人看了不顺眼！笔者百思不解立碑者的“良苦用心”，真是啼笑皆非。

1966年至197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使文殊山石窟寺雪上加霜，陷入彻底毁灭的绝境。残存的大部分山寺、洞窟、壁画、彩塑被毁，碑碣、匾额、题识不翼而飞，山中积累千余年的文化艺术荟萃，毁之殆尽。

“文革”结束，大地回春。198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审定并公布文殊山石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宗教政策，制定宗教法规，划清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的界限，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振奋爱国爱教精神，文殊山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传统的庙会得到恢复。随着群众性修寺建庙的热潮，不少被残被毁的寺庙得到修复。笔者参观了前山新修的“大雄宝殿”，也去造访了“千佛洞”和距其北100米处的“万佛